

# 理论创新与思想先声:喜迎党的二十大(专题讨论)

## 中国式数字文明的形成、特质与意义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刘卓红<sup>1 2</sup> 刘 艺<sup>2</sup>

(1.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2.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州 510631)

**摘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生产方式变革、新一轮技术革命爆发和数字时代的现实需要构成了数字文明形成的动力。文明是进步的同义语,数字文明的发展呈现出现代文明在数字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数字资本对文明具有二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西方数字文明,无法解决因数字资本自身的内在矛盾所引发的“数字资本主义”“数字霸权”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式数字文明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资本的制约作用,以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凸显数字文明的包容共享性、开放共治性、全人类性的鲜明特点。构建中国式数字文明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极大推动了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

**关键词:**数字文明;中国式数字文明;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2)07-0001-08

习近平总书记在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时提出“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sup>[1]</sup>数字文明以数据为生

产要素,形成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技术框架,实现了网络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深度融合。数字文明的形成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深远影响,开创了一个相较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更高阶段的新文明形式。中国式数字文明作为社会主义文明的当代新形态,拥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既能够实现对资本和技术的双重超越,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又能够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携手各国重构一个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世界秩序,推动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

① 关于“数字时代”的使用,学界有很多讨论,比如关巍、王宁、章剑生等人表述为“数字化时代”,而阳镇、陈劲、王伟进等人表述为“数字经济时代”。通过查找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本文选择使用“数字时代”这一表述。

基金项目:2022年“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2ZDA002)

作者简介:刘卓红,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一、数字文明的形成

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经历了蒸汽文明、电气文明、信息文明。进入数字时代,<sup>①</sup>数字技术改

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产生新的商品形式,从而催生出新的文明形态——数字文明。数字文明的出现不仅归因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强调的生产方式变化的根本缘起,而且数字技术革命的爆发和数字时代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数字文明生成的动力源泉。

首先,数字文明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生产方式是衡量文明发展的根本尺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摩尔根、傅立叶等有关文明思想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视角考察了文明的发展与生产方式的关系,认为生产方式变革是文明发展的动力。“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sup>[2]</sup>新技术、新机器的出现,以及投入生产加以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创造出新的劳动方式和生产关系,而且推动社会体系内部相互作用链条并传递到生活的各领域,引起文明的演进。除此之外,新技术、新机器的更迭过程还导致社会的连锁反应:“使用机械辅助手段而获益一旦成为先例,一切工业部门也就渐渐仿效起来;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sup>[3]</sup>与此同时,“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sup>[4]</sup>。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封建主的社会”“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均属于社会文化类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中,物质生产方式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创造出一个特定的文明形式。

数字文明仍遵循马克思主义对文明性质的界定,即文明是一个历史范畴。数字文明是文明发展的更高阶段的呈现,代表的是数字技术蓬勃发展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水平,其形成归结于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文明的数字化和数字的文明化的内在统一。在历时态维度上,数字技术作为新的生产工具,产生了新型的数字生产力,相较于机器生产所代表的生产力更为先进。生产领域发生的

重大变革的根本所在,就是科学技术带动自动化生产、数字化制造、人工智能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数字生产方式。在共时态维度上,当20世纪世界上出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后,东西方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使数字文明发展呈现多样性和不平衡性,这就为开展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之间的比较提供了可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sup>[5]</sup>资本主义生产逻辑虽不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但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能释放出数字资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动力,而且能引导这种动力激活“数字资本的文明面”,让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再简单地重复或追随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道路,而是主动寻求新的、更为合理的数字文明发展模式。

其次,科技革命带来技术范式的转换,从而带动数字文明的转型。在托马斯·库恩“科学范式”概念的基础上,G.多西将“范式”引入技术创新之中,提出“技术范式”的概念,劳丹、芒福德、海德格尔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技术范式的内涵。在这里,暂不细分技术范式的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差异,而是要重点讨论技术范式更替与文明演进的关系问题。自人类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演进历程,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且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引起技术范式的历史性更替,技术范式转换带来的一系列新技术、新发明和新创造,影响着人类社会各个领域,进而使人类文明演进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简言之,由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范式更替,是推动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力量。从历史的宏观视野看,17—18世纪蒸汽机、纺织机等机械发明的出现,使科学理性代替了宗教神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产生新的机械唯物主义范式;工业革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使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以及人的生存方式等发生根本性变革,人类步入了工业文明时代。当今世界进入了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交

替的历史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及其相互融合,如由5G、物联网和区块链造就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实时链接,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融合等,改变了工业文明的众多方面,新的技术范式代替了机械唯物主义范式。在新技术革命进程中,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企业赋能,与前几次科技革命的不同表现为,“互联网变得无所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变得更小、性能更强大、成本也更低;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也开始崭露锋芒”<sup>[6]</sup>,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万物互联”(Internet of Everything)。数字技术推动了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新的技术范式的出现表明人类社会进入了全新的数字文明时代。

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显性标志。在文明进步的意义上,数字技术的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分工和协作,人类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掌握新技术、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把数字技术广泛运用到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并使其融为一体,促进了人类新的文明形态的诞生。首先,数字技术拥有赋能的特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在万物互联基础上撮取及感测数据,不仅促进了数字资本流动以及数据信息的传播,而且随着网络的扩大化和规模化,逐步消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数字经济要素的快速流通。这些均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和调度生产,加速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通过对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为交通、能源、物流、环保和医疗等领域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有助于建设智慧城市,推动城市现代化发展。其次,AR&VR、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联结虚拟现实,特别是元宇宙概念的出现,从思想上改变了人类对空间的认知,即人类世界开始从单一物理空间的“平面公开”迈向跨越物理和数字双重空间的“立体可视”,实现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密切嵌套联结,推动人类文明进程进入新阶段。技术作为衡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而新的生产力主要通过技术能力加以体现,勾勒出某一历史时期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然而,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全是技术演进史,并不能用技术指标作单一的衡量,它还应包括不同历史时期对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的现实需要、人类使用技术工具对自然和社会的能动改造等动力因素,以此丰富文明的内涵。

最后,数字时代的现实需要期盼数字文明。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伴随新的文明形式的出现,如机器工业的发展促使农业从传统手工业转向资本主义机器大农业,工业文明在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机械化大生产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而在这一过程中,工业文明历经了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等不同阶段。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数字生产方式的智能化发展,大数据、量子计算等新兴科技相继出现,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实体经济、社会治理等领域,呈现出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融合、数据与人交互的时代潮流。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文化体系和资源分配体系逐渐瓦解和重建,催生了一个以数字技术为运作规则的全新时代。

数字时代与先前时代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在机械化和电气化时代,人类主要利用新技术实现对物质能量的充分利用。在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IT)是技术进步的最新成果,人类活动范围依然以物理世界为主,遵循线下的流程化思维,软件系统只是一种工具,而数据是其运行过程中的副产品。但在数字时代,人类通过对物联网、区块链、AR和VR等数字技术(DT)的广泛使用,物理世界被重构建模到虚拟的数字化世界,人们的生产、生活等活动都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在虚拟世界里得到实现。数字时代实现了从信息化向数据化的转变,此时,传统的物理世界便成为数字化世界的辅助,人类也超越了物理实体的范畴,构建起新的数字化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

对生活在数字时代的个体来说,为了适应数字化生存和生活方式、弥合数字鸿沟,需要提高自身的数字素养;对整个社会而言,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比如,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完善数字经济治理、建设数字社会等等。数字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文明形态,主要是指在数字技术主导下,人类从事物质生产、生活等实践活动呈现的一

种社会进步状态;数字文明是由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文化、数字社会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由此可见,构建数字文明,能够极大地满足数字时代在社会生产、生活、生态等各方面的现实需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提出数字文明的概念,明确强调要把增进人民福祉、构筑全体人民畅享的数字生活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积极倡导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推动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当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长期的制度和技术环境优势,造就了有利于数字文明发展的良好条件,比如,数字化模式运营传统服务业、数字化的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数字产业居于领先地位。我国作为新兴工业大国,数字经济发展处于相对弱势,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投入等方面也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西方作为上一次工业革命爆发的中心,其产业和企业拥有庞大的技术经济模型,难以作出规模上的改变,对新技术的接纳和推广过程也异常缓慢。相比之下,中国作为新兴工业大国更容易接受新技术、理解新技术,能够清晰地把握新概念和新商业生态的发展逻辑。在技术应用阶段较少存在抵制的情况下,能遵循社会发展的需求导向和规模导向,以较快的速度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发展,为中国开启数字文明的大门奠定物质基础。中国式数字文明是具有明确价值引导的数字文明,拥有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特质,能够实现对资本与技术的双重超越,能为建构起一个全球参与、数字向善、全民共享的新的文明作出贡献。

## 二、中国式数字文明的特质

数字文明是在全球化视野下,以数据和算法为生产要素,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影响深远的人类文明。数字文明的生成与发展逻辑遵循事物发展的辩证性法则,对人类呈现出双重影响。以资本文明为主流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按照资本逻辑主导的方式达到资本增殖目的的文明形态,最终造成文明的内在冲突与矛盾激化。相反,中国式数字文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制度优势,能够善用数字资本,在规避其局限性的同时,使数字资本在生产领域发挥积极作用;能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打破西方构建的“零和博弈”的价值体系,重建一种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数字文明;能够坚持数字经济为人民所用,超越资本主义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历史局限性,凸显社会主义文明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引领数字文明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概言之,中国式数字文明从形成的那天起,就展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数字文明不同的特质,具有鲜明的共享性、共治性和全人类正向性的鲜明特点。我国还依托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市场优势,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互促进的基础上,实现数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塑造了不同于西方数字文明的新形态。

首先,中国式数字文明具有共享性的鲜明特点。数据作为数字文明之基,是在经济行为中自然产生的,其本身蕴含的价值主要通过汇聚发挥作用,全球数字化程度越高,数据要素的价值就越大。数字文明具有天然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是先前任何文明形式所不曾拥有的,加之数字化连通的方式,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的数字化效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数字帝国主义的产生。但从狭义技术视角看,数字技术的内在价值是中立的,即技术一旦被创造出来便脱离创造者独立存在,其所承载的价值是外部赋予的,本身只有潜在的属性和功能,不能负载创造者的价值。因此,技术在为使用者的目的运转时,便被注入使用者的意志和价值观。为避免技术异化,数字技术发展可借助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摆脱资本主义意志与价值的束缚,按照技术自身的内在逻辑发展,从而服务于各种目的的实现。

数字时代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遵循工业革命时期的资本私人占有逻辑,即资本家拥有数字化劳动资料的所有权,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数据垄断,通过确立不平等的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所有制,使数字平台、数字产业按照资本剥削逻辑运转,引发“数字鸿沟”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sup>[7]580</sup>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字技术发展

是扭曲的,被附加不合理条件后的技术只是资本剥削的工具。也就是说,西方文明中心论构建的是以弱肉强食和扩张性为主的发展模式,在工业革命时期虽然为发展生产力作出巨大贡献,但其本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sup>[7]36</sup>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掌控了国际话语权,将西方价值观念生成为全球性的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导致大多数国家受制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失去了自己的主导权。

中国式数字文明不仅扬弃了技术的理性统摄,坚持数字技术发展的价值追求,而且赓续传承中华优秀文明基因所蕴含的追求和平发展、共同繁荣、合作共赢的中国智慧,比如东西方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制定的不同的应对政策,就直接反映出东西方文明对数字技术应用的重大差异。我国在推动数字技术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监管数据收集和使用等方法,避免出现数据垄断、滥用等问题,做到在利用技术的同时实现数字技术的文明化;坚持以人为本,弥合数字理性造成的单一性,实现世界各国共享数字文明发展红利;注重树立科技向善的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数字技术,着重解决大数据杀熟、平台算法歧视和基因编辑婴儿等科技伦理问题,营造数字经济创新生态,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凸显中国式数字文明的共享性。

总的来说,中国式数字文明的开启,对破除西方文明的利益至上价值观念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数字技术具有共享性的鲜明特点;另一方面,中国式数字文明秉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文明观,超越了西方“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坚持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平等合作,为世界各国描绘了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前景。

其次,中国式数字文明具有开放共治性的鲜明特质。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以及带来的全球数字化转型,使发展数字技术要兼顾全球秩序的做法,成为开展全球数字治理的重要一环。全球数字治理指的是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应对数字技术发

展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问题。在政治层面,数字技术发展的条件和参与主体超越了国家边界,搭建了国内与国外、国家与国家之间广泛联结的全域网络,使资源分配、安全维护等国家事务不仅与本国国内个人、组织等治理主体有关,而且也受到他国规则和主张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这意味着全球多元主体被连接在同一个治理场景,急需形成世界各国参与其中、共同管理的开放性共治机制。在经济层面,数字技术的灵活性、生成性和创新性,使其编码、组件、模块可以低成本更换,通过自我复制实现性能升级与功能跨越,进而迅速覆盖更多应用场景。这种强适应属性推动技术研发和应用从组织内部转移到社会范围,在实现社会研发、应用的同时,也为市场和消费者提供了新的数字产品和数字化服务。显然,经济领域的数字化转型重构并生成新的市场,必将再次促进数字经济新一轮发展。在社会安全方面,跨境治理场景中存在境外行动者和“无秩序者”,他们会在跨境数据流动、网络安全等领域引发数字问题或数字风险,成为全球治理的不稳定要素。这就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尤其是在数据安全维护、跨国移动与交易和数据犯罪治理等领域,要建立跨国数字社会治理制度,构建世界数字治理共同体。

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文明交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抓住了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核心技术,使得生产力迅猛提升,形成了发展水平较高的文明,并在现代文明交往中处于主导地位。为避免西方数字霸权和单向剥削,打破其塑造的数字监控网络,免于被数字主权支配,中国式数字文明针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治理问题,积极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其一,高速泛在、云网融合、天地一体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实现治理数字化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同类数据的互联共享,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跨地域的协同平台。其二,区块链、网络化群控技术、大数据可视化、卫星通信网络等技术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公开透明和可追溯特点,可以解决数字化治理在处理信息系统丛林、信息壁垒问题时引起的数据信息安全、算法歧视等隐患。数字技术的这种特质,增强了

数据信息的开放性,淡化了人为操纵色彩,使各国信息交流互动更为高效,促使信息传播速度呈指数级增长。这种高质量的数据互联与信息共享打破了治理主体互动的时空限制,降低了交互成本,提升了沟通效率,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低成本、高可信度的信任机制,奠定了世界各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信任”基础。在互信互助前提下,用数字化技术联结每个社会要素,为全球治理带来更大价值。其三,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对数据信息进行梳理和深度分析,有效汇集了不同治理主体的需求和偏好,更有利于协调各方利益。“去结构化”的信息交流平台,加快了数字技术互联互通建设,形成开放、流通的网络公共空间,实现去权威化、去中心化,提升治理精准程度,推动全球数字治理构建包容、开放、合作的新模式。

最后,中国式数字文明具有全人类性的鲜明特质。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将文明限制在一国范围内,数字化程度的深入发展,把全人类带进数字文明这一高级发展阶段。从技术层面来看,数字文明的全人类性体现在两个方面:数字平台对个体数据信息的深度挖掘和快捷传播,极大提升了个体对数据信息的获取和使用,使个体数字化发展的新形态应运而生;随着全球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深入发展,带动了全球网络数据信息的整合,强化了跨国家、跨地域的网际协作,提高了不同数据信息主体之间的全程联通和使用,从而形成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巨大的社会信息网络。这既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技术基础,也体现出数字文明不断发展的内在逻辑。

数字技术呈现的全人类性特质还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在经济领域,区块链、物联网技术天然的共享特质,推动了共享经济的发展,其最大的特点是离散程度越高、价值集中越快,使出行、餐饮、教育等分散程度高的行业被共享经济改造,世界范围内信息交流的速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在政治领域,数字技术安全性强,数字信号加密方便,能够极大地增强信息传输的安全性。在文化交流方面,数字媒体打破地理界限,催生了新的交流与连通方

式,人类互通往来以数字化形式进行,实现了人员的虚拟流动,推动全球化跨境交流。

由于数字全球化进程是非均衡的,先发国家凭借数字技术优势形成“数字鸿沟”,以欧美为主导的先行梯队在技术进步、关键资源和治理机制等方面具有主导性话语权,阻碍了世界各国之间的协同发展。但从全球视野看,数字全球化是当今时代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加之数字技术具有易获取、可扩散和可传播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用数字技术的现实差距越来越小,这将从更深层凸显数字文明的世界性、全人类性,从而引领国际数字格局发展。

生产要素的数字化渗透催生了数字商品的出现,每个人在其中都变成“产消者”,人们开始重新关注人本身在数字社会生产中的主体性问题。为了避免被数字技术控制、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人类力求在劳动中创造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复归。中国式数字文明的发展在价值引导下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前进方向,即数字化本身不是最终目标,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是数字文明的根本发展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全球携手开创数字合作新局面,不断完善人类数字化社会的整体建设,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努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高理想,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 三、中国式数字文明的意义

中国式数字文明的包容共享性、开放共治性和全人类性价值引导,使数字技术获得了精神指向,实现了对资本与技术的双重超越,从理论上推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中国数字技术发展的实践验证了中国式数字文明的科学性,中国将成为数字文明国家的典型代表,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

中国式数字文明彰显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进一步丰富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坚持从唯物史观角度认识社会文明发展的规律,在肯定资本主义文明推动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进步的同时,要认清资本主义文明的自身基本矛盾,其推动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

正在逐步减弱。在马克思的眼中,资本主义文明绝不是人类的最终文明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未来社会新文明是共产主义文明的伟大设想,但这些设想由于没有以社会主义实践作为基础,未能真正付诸实施。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明思想的基础上,总结我国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把握当今数字时代发展新潮流,提出了中国式数字文明的新概念。

中国式数字文明坚持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理念的基本内涵,始终坚持把人的全面发展当作最终目标,强调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回应了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如何发挥数字技术的正向作用推动构建人类新文明形态,从而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问题。这一理念的提出,既阐明了中国对人类文明进步、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立场和主张,也驳斥了坚持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逻辑并试图垄断数字资本以剥削其他国家的思想,引发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评价,有力地批驳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错误论调,对世界文明发展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

中国式数字文明彰显了数字文明的实践伟力,必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

在经济建设方面,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推动了数字要素快捷流动,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畅通了国内外经济循环,更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从供给端看,深度学习、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促进生产端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准确预测生产需求的趋势与波动,避免了过度生产。数字技术还驱动去中介化,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信息的透明度,进而提升了经济社会发展效率。从需求端看,数字化赋能改变了消费方式,企业借助大数据共享平台能够有效识别不同个体或群体的不同诉求,真正实现差异化服务,在满足人们多元需求的同时推动实现要素的供需平衡。

在政治建设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政府管理的各项服务,实现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数字政府建设不仅能完善政府服务方式,为人民打造一个泛在可及、智慧便捷的数字化服务体系,以实现政务服务与人民群众需求的精准匹配,增强人民

的满意度,而且政府数字化转型驱动社会治理方式变革,全方位地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和模式优化,有效提高政府决策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撑。

在文化建设方面,数字文化产业与金融、物流、农业、电子商务、教育等领域融合发展,让文化活动搬上“云端”,加之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互联网平台繁荣发展,满足了人们的线上文化消费需求。同时,文化与“互联网+”战略的深度融合,以数字共享的形式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供给水平,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数字图书馆、虚拟博物馆、慕课等数字资源,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对文化传播来说,借助数字技术与文化融合的方式,延伸了文化产业链,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实现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重要支撑。

在社会建设方面,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为人民提供了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民生保障重点领域,实现了数字化服务和公共服务机构资源数字化,极大提升了公共服务品质。在城乡建设上,数字技术助力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城市数据大脑建设、城市治理智能化等实践活动,有力推进了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数字化治理,新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牧业等诸多领域,全面提高了乡村宜居度。随着数字化生活新场景的构筑,数字技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数字技术便捷、实时、共享的特点,可以消除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数据孤岛等难题。如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平台建设,能够实时动态监测生态环境指标,并对人类行为的生态风险进行评估,创新原有生态环境治理机制,提升生态治理能力。数字平台、移动互联网的受众群体广、传播速度快的特点,有助于提升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有助于人们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全社会

范围内实现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式数字文明彰显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取向,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当今世界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时代,但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又有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sup>[8]</sup>世界格局呈现“东升西降”的趋势,对人类文明发展来说,出现了历史性重构的契机。特别是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不断重塑制度、催生变革,并影响社会文明进程,这是不可逆转的时代发展趋势。面对数字文明向何处去的新课题,东西方文明给世界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方案。西方文明依旧坚持理性人假设的思维定式,寄希望于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数字资本在全球的增殖,坚持“修昔底德陷阱”,以对抗的零和思维“分裂”世界,并借助其在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确立的统治地位,主导全球性议题的话语权,推动西方文明全球化。但是,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非西方元素不断增加,非西方世界逐渐摆脱对西方文明的盲从和畏惧,在此背景下,中国贡献的文明方案是“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sup>[1]</sup>这是一种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社会主义文明于一体的中国式数字文明,是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和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新型数字文明,它不仅符合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消除文明霸权、构建文明平等局面贡献中国智慧,而且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奉行的“文明冲突论”“文明优劣论”,有利于消除各种中心主义,促进世界各国携手共建一个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数字文明。

中国式数字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摒弃了文化、国家、种族和意识形态界限,秉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念,为人类文明走向更高阶段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案。一方面,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成果丰硕,比如,拥有全球领先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全球规模最大的5G网络建设等,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为我国构建现代化

经济体系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有助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另一方面,我国坚持在推动数字文明发展的同时,致力于将自身发展优势转变为世界各国发展机遇,激发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活力,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在人类交往过程中得以延续和发展,中国将通过不断深化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例如开展“丝路电商”合作、举办进博会、设立亚投行以及签订《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等举措,推动国际社会逐步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重构人类通往现代化的文明逻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sup>[9]</sup>未来人类文明发展形态不是资本主义文明所掌控的“从属”世界体系,而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倡导的、世界各国交流互鉴的、符合人类社会规律和全人类价值追求的一种人类文明新图景。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人民日报》2021年9月27日,第1版。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1页。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7-928页。
- [6] 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李菁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4页。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
- [8] 习近平《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1年4月21日,第1版。
- [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

[责任编辑:朱 磊]



## ABSTRACTS

### Formation ,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style Digit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IU Zhuo-hong<sup>1,2</sup> , LIU Yi<sup>2</sup>

( 1. School of Marxism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 Guilin Guangxi 541004 ,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631 ,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the change of production mode , the outbreak of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realistic needs of the digital age constitute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formation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 is the synonym of progres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presents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Digital capital has a duality to civilization: the Western digital civilization developed under the capitalist system can't solve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digital capitalism" and "digital hegemony" caused by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digital capital itself; based on the restrictive effec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capital and the adherence to the vision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 the Chinese-style digital civilization highlights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siveness and sharing , openness and co-governance and all humanity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style digital civilization has great theoretical , practical and world significance , which great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Digital Civilization; Chinese-style Digital Civilization; Digital Age; Digital Technolog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Jacques Rancière's Left-wing Literary Theory and Mao Zedong's Thought on Literature and Art Centered on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HAN Zhen-jiang

( School of Humanities ,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240 ,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certain rela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ontemporary French aesthetician Jacques Rancière's left-wing literary theory and Mao Zedong's thought on literature and art. Before and after May 1968 , Rancière was influenced by Mao Zedong's philosophy and literary thought. He believed that there is no need for the mass to have a high degree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s Althusser-style intellectual teachers , workers and students. They can also have aesthetic percep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is context , Rancière's notions of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art of those that have no part" are both similarly linked to and structurally different from Mao's concept of politics of liberation and "the people". Moreover , Rancière's literature politics has some reference to Mao's "the people's art and literature".

**Key words:** Jacques Rancière;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Maoism; Mass Line

[英文编校: 宋琳琳]